



文艺思想杂谈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迎接新的一年	束 为	(1)
閑話“深入生活”	馬 峰	(4)
每个同志必須多讀熟讀	鄭 篤	(7)
魯迅——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和榜樣	鄭 篤	(1)
不要忘了讀者對象	馬 峰	(23)
跃进声中話文风	鄭 篤	(26)
反对恶劣文风	唐 天	(34)
党不能領導文艺嗎?	束 为	(38)
談“写眞实”	唐仁均	(45)
必須维护党对文艺工作的領導	淮南 裴耶	(49)
驕傲引向墮落	胡 正	(54)
清除“一本書主義”的毒害	韓文洲	(60)
文艺工作者必須改造思想	汪 洋	(63)
文学——阶级斗争的武器	韓鍾昆	(67)

迎接新的一年

東為

省級文艺机关团体中，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志就要出发了。这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走在前边的同志们，你们得到了最早上山下乡锻炼的好机会，是最幸福的。我们这些留在后边的人，向文艺界的先锋部队表示真诚的欢送之意。我留在后边了，可是，很快就会赶上你们的。

谈谈入城以来的这几年吧。这几年，在我们文艺界常常谈到“体验生活”，并且用这种办法建立文艺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的联系，我们是这样作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并不坏，至少比起关在家里闭门造车好一些。可是，仔细想来，这种“体验生活”的办法，并不能算作最好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再进一步考察“体验生活”的情况，那就会发现，有一种袖手旁观的现象在一些“体验生活”者的身上存在着。这就大大妨碍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妨碍文艺创作，妨碍文学艺术与广大人民的紧密的联系。现在党提出上山下乡，长期的，全身心的到群众中去劳动锻炼，到基层去锻炼，这正是改进文艺工作的最好的办法，也正是符合有志气的文艺工作者迫切的要求。

谈起上山下乡，就自然想起1942—1943年老革命根据地文艺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是在1942年发表的。这是重要的一年，是革命文艺发展历

史上的分水岭。毛主席在講話中提出了工农兵文艺方向問題，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深入斗争、改造思想等問題。毛主席的講話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当时，老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用他們的滿腔热情和坚决的行动，响应了党的号召，紛紛下乡、下厂、下連队。在文艺界，到处可以听到动人的口号：“到敌后去！”“到农村去！”“到連队去！”“到前綫去！”我記得，在当时的延安，許多文艺工作者毅然决然的到敌后去了。我們一批在学校里学习的青年，对于毛主席的号召理解得虽然浅薄，但是受了“下去”的影响，也离开了延安，重新回到晋綫根据地。我們那一批同志被分配到各地实际工作中去了。大部分是到了农村，搞減租減息工作。1943年，对于我們这一批青年文艺工作者來說，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許多同志接近了根据地的农民，富农，地主，了解了农村的斗争，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在当时，最当紧的事情，是研究党的減租減息政策，想各种办法发动群众，为农民減租減息。每年还要进行一两次反扫蕩。靠近黄河边的河曲、保德、兴县等地，对岸的国民党顽固軍半夜里还常常过河来杀人搶东西。在那种情况下，不依靠群众依靠誰？什么个人奋斗，什么文艺創作一概置諸脑后了。时间，精力，情况都不許可进行文艺創作。从那一年起，以后陆续到农村去。1947—1948年，晋綫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大大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取得了丰富的創作材料。許多較好的作品，都是出自参加了实际斗争的同志之手。文艺創作出現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馬峰、西戎同志的“呂梁英雄传”，孙謙同志的許多剧本，都是在参加实际工作之后写出来的。我听说，太行根据地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們都熟悉的赵树理同志，生长在

农村，一向生活在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苦，因此，他才写出了“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三里湾”等許多优秀的作品。还有許多优秀的作品，都是在响应党的深入工农兵生活的号召之后創作出来的，这是已經證明了的宝贵經驗，这个經驗是應該記取的。現在比1943年的条件好的多了，我們相信，这一次文艺界下放干部，上山下乡，必将为我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創造新的面貌。

文艺工作者下乡上山，并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长期的，终生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志就要出发了。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應該立下志愿，作好思想准备，随时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去吸取营养。作一个又紅又专的，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

新的一年将要开始了。讓我們用英雄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年！迎接光辉灿烂的未来！

（1957年12月30日山西日报）

閑話“深入生活”

馬 煒

我們在評論一些作品和作者的時候，常常會提到“有沒有生活”這句話。所謂“有沒有生活”，主要是指有沒有工農兵群眾的生活，也就是說作者對工農兵群眾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以及熟悉和了解的程度如何？這裡所指的不僅是群眾語言，生活習慣，勞動過程和鬥爭形式等方面，更重要的是指人——對人的了解。

我們一些同行的老朋友，在一块閑談的時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熟悉其他方面比較起來還好辦一些，而最难的是了解人。我們的作品大部份是描寫農民的，但活在我們腦子里的農民形象却不多，甚至是少得可怜。如果說也有一些人物形象的話，那只不过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現在作品里所写的一些人物，大部份還是抗日戰爭和土地改革時的存貨。也就是說是那時候所認識、熟悉、了解的一些人。全國解放以後，我們並沒有和農民完全割斷聯繫，差不多每年都要抽出三五個月時間到農村去“體驗生活”。但為什麼對農民的了解愈來愈少，愈來愈淺呢？主要原因是生活方式不同了，過去生活在農村里，自己是群眾中的一份子，擔着一定的工作，負着一定的責任。可以說是和群眾同命運共呼吸，進城以後情況改變了，家在城里，到農村去只不過是臨時做客。雖然有時候也幫助做點實際工作，參加一些體力勞動。

但这和旧戏班里的“票友”差不多，只不过“玩票”，有兴趣就“客串”个角色，没兴趣说走就走了。你的走和在，对这个集体无所谓，既增加不了什么光彩，也受不了什么损失。正是因为是这样，大家也就把你当客人看待，不管是“受欢迎的客人”也要；“不受欢迎的客人”也要，总而言之是客人。既是客人，主人人们也就会在各方面迁就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知心话也就不会来找你谈，找你来解决。因而你对他们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深刻的了解。

文学作品主要是描写人，如果作者对自己所要描写的对象不熟悉不了解，或仅了解一些外表，而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心理状态、性格特征不了解，怎么能够创造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呢？怎么能够写出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来呢？当然不可能。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决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党号召作家深入生活，也就是要改变作家们过去那种走马观花式的，作客式的生活方式——到群众中去安家落户，参加劳动，担任具体工作。只有和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才有了解他们的可能。所谓“可能”，这只不过是说才具备了起码的条件，要真正了解他们，更重要的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否则即使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可能是“同床异梦”，结果还是互不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知心朋友，所以能够成为知心朋友，就是因为思想情感相一致，互相了解。要真正了解劳动人民，就必须先要让他们了解你，要真心诚意地对待他们，不能有一点点虚情假意。有个同志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土改时候，有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到乡下工作去了，他和另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同住在一家贫农家里。那时

參加土改的人都是和貧農同吃同住同劳动，當然他們也不例外。有天吃飯時候吃的是滬壞的谷面窩窩頭。貧農問那位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說：“老張，很難吃是不是？”當然很難吃，但他怕說出真心話來，別人笑話他不能吃苦耐勞，於是裝出一付高興的樣子說：“很好，非常好吃。”那位貧農笑了笑，回头又問那位農民出身的干部：“老王，你覺得怎麼樣？”老王隨口說：“太難吃了，比地主家的豬食也強不了多少。”停了一下又說：“這東西要好吃的話，咱們進行土改干什么？”那個貧農听了非常滿意。以後他有什么做不了的活，總是喊老王來幫忙，而不願去惊動老張；有什么知心話也是和老王談，而不去告老張。因為他覺得老王是他們自己人。他对老张虽然也很尊敬，但觉得他是客人。

深入生活，而不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不能和劳动人民在情感上融洽无間，实际上也就深入不下去。

（1957年12月30日山西日報）

每個同志必須多讀熟讀

——“文艺战线上的一場大辯論”讀后

鄭 篤

周揚同志不久以前，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所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場大辯論”一文，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每个从事文艺以及喜爱文艺的同志，都必須多讀、熟讀。这篇文章不但对去年文艺界所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作出了极为深刻的总结，向我們指出了很长时期以来，在文艺界所存在的两种世界觀和两条路線的尖銳的和复杂的斗争，同时它还更深刻的告訴了我們許多极为深刻、极为警辟的道理和理論。

这些极为深刻极为警辟的道理和理論，据我初步的理解和体会，就是：“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我們的文学艺术在表現人民如何同他們的压迫者、剥削者作英勇卓絕的斗争这一方面繪下了悲壯的震憾人心的画卷。但要表現人民自己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之后如何正确地处理他們自己之間的矛盾，如何擺脫长期被社会遺留在他們身上的影响，如何正确地解决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如何讓先进克服落后，并带动落后的人一同前进，这就在我們的作家、艺术家面前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創作上的任务和一連串新的問題，需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文学艺术来解决。”以及每个文艺工作者，如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文艺革命战士，就“必须象‘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否则，就会象‘共产党宣言’中所批评的那些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诗人一样，写出来的作品名曰，‘社会主义’的，而实际是资产阶级的”等等。

除此以外，如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所犯错误的分析和概括，以及指出：“我们的文艺如果要达到一个新的跃进，就必须在更大的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都是极为深刻和极为警辟的。但以上所说，也还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周扬同志这篇文章的内容，正如全国文艺界许多同志所说那样，它的内容，的确太丰富了，如果没有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多读、熟读，绝不会了解得很深刻和很全面。

为了和我省文艺界同志，共同努力学习周扬同志这篇文章，共同努力提高自己思想水平，现在我愿将我初步读了这篇文章的一些比较突出的感觉，写了出来，作为认真学习这篇文章的一个开始。

一、在大风浪中，为什么有不少人经不起风险和考验？

大家都知道，在反右派斗争以前，在我国的天空上，曾一度乌云密布，许多牛鬼蛇神，到处兴风作浪，但由于党的英明领导，以及全国人民和很多同志的奋起应战和英勇斗争，这股妖风，很快就被彻底打垮了。但在这次大风浪中，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表现得很坚决和很坚定，有的人已踏入了右派的泥坑。全国解放到反右派斗争以前，很多人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已整整七八年了！为什么还经不起风险，经不起考验呢？我觉得每个同志还应再细致的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題。

那么問題的症結在那里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少同志，虽然早已参加革命或早已从事文艺工作了，但一直并未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来。对于文艺工作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它的发展规律的最基本的看法和态度，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不同，因此其所持态度和看法也就各不相同。我們說，文艺是有阶级性的，但资产阶级的学者說：“文学一概都以人性为主，絕无阶级的分別”。（反动文人梁实秋語）也有的說，文学是“卖淫妇”，“于是资产阶级想占有她；无产阶级也想占有她”（以“第三种人”自居的反动文人苏汶語，見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其意是說，文艺并无什么阶级性，只是因为那个阶级也总是想占有它，所以它才有了阶级性。也有的說，文艺完全是一种消遣品，其作用无非是供人消愁解闷或娱乐而已。不管有多少說法，归纳起来，只有两种。这就是：一种認為文艺是有阶级性的，一种認為文艺是超阶级的。

那么那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呢？不用說，自然是前一种。但在反右派斗争以前，可惜还有很多同志，对这一点，一直很不明确。我所以这样說，是从不少同志的行动上看到的，如果只从口头上，或只从一些文章上来看，也可能不是这样。但空談是无济于事的。不信？我們还可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些情况。

大家都知道，全国解放以来，文艺界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但在每次斗争中，我們所有的同志从思想上来看，是不是都很明确、都很自觉呢？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相反的，在历次的斗争中，表现得頗为麻痹，或漠不关心的，还是大有

人在。

周揚同志說：“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接着又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的斗争是长期的，时起时伏的。每經一次紧张的斗争，工人阶级就受到一次严重的锻炼和考验。不管道路多么曲折艰难，斗争的最后结局，总是革命战胜反革命，新事物、新思想战胜旧事物、旧思想。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此，文艺的发展也不例外”。

以上这段話，我覺得宛如耳提面命的在告訴我們說，文艺不但是有阶级性的，而且是阶级斗争的最前哨阵地！因此，我們对文艺工作的看法，絕不能把它看成是世外桃园，看成是超阶级的，或与阶级斗争是毫无关系的。相反的，我們还應該有更进一步的認識。这就是，每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都必須很自觉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光荣的文艺革命战士，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絕不动搖。

但如何才能具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文艺观呢？我覺得，每个同志一开始接触文艺工作时，必須作这样准备，过去沒有作过这样准备的同志，現在也必須把这一課补了起来。这就是：

第一、必須認真的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閱讀和学习好多次。毛主席的这个講話，就是我国革命文学的理論基础和奠基石。我們在一开始接触文艺工作时，就去認真的学习，就可以了解文艺工作的性质和作用，更好的树立工人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观，同时也可为今后繼續深入学习这一著名著作，打下初步基础。

毛主席在“講話”中曾說：“在我們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說有文宣两个战线，这就

是文化战綫和軍事战綫。我們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們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團結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另外又說：“我們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組成部份，作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前面我們所引用的周揚同志的那些話，我觉得就是从这里引伸出来并加以發揮的。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这个講話的同时，还应認真的学习一本写得比較好的中国現代文学史。因为从中国現代文学史里，我們就可更具体的了解到革命文艺在和敌人进行残酷搏斗的許多情况，从而更加加强我們的革命的斗争积极性和勇气。

关于这一点，周揚同志在談到必須反对修正主义时，也提得很明确。他在那段話里，不但告訴了我們，我国革命文艺在白色恐怖时代，是如何的艰难，同时他还具体的告訴了我們，我国革命文艺曾經同那些反动阶级的文学代理人，进行过尖銳的斗争，以及如何彻底粉碎了他們的情况。我觉得这对我们既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也是一个极为有力的鼓舞！

第三、周揚同志在这篇文章里，提出要我們必須象“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即必須和“过去遺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決裂”。在反右派斗争以前，我們文艺界所以有不少同志曾迷失过方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比如：什么叫“有知”，什么叫“无知”，什么叫“有才”，什么叫“无才”，什么叫“光明”，什么叫“黑暗”，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宗派主义”，

什么叫“教条主义”，什么叫“真实”，什么叫“粉飾現實”……等等，对于所有这些观念，就都應該有一个新的認識和新的了解。在反右派斗争以前，許多右派分子不是就曾利用这些好听的名詞，向我們大肆进攻嗎？有許多同志，不是因为沒有和“过去遺傳下来的”这些观念，“实行最彻底的決裂”，因而失掉立場，大上其当，作了右派分子的俘虏嗎？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和“过去遺傳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決裂”呢？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必須努力学习馬列主义，并根据馬列主义的理論，認真改造自己思想。在反右派斗争以前，有很多同志对学习馬列主义，很不注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偏向，今后必須彻底加以克服！克服办法就是：必須強調政治是統帥、是灵魂。談到这里，也許有人会說，現在我們已将右派分子的进攻，完全打垮了，何必再来学习馬列主义呢？是的，現在我們的确是胜利了，但我們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間的斗争，却还远远沒有結束。这是因为在全世界上不但还“存在有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的对抗”（周揚同志語），同时，在我們國內也还存在有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即使國內沒有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也是很难一下彻底肃清的。周揚同志說：“資本主义制度和文化虽然已經沒落和腐烂，但对于許多人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以上三点，可能很不全面，但是，如果我們能够認真去作，我相信，在以后的斗争当中，我們就一定会比在反右派斗争以前，能够經起风险，經起考驗的。

二、党要每个同志“又紅、又专”，怎样才能又“紅”又“专”呢？

經過反右派斗争，我們对資產階級思想已給以致命打

告，这对解放全国人民思想，促进各种革命事业的大发展、大跃进（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确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正如周揚同志所說，这是“清理旧基地”和“开辟新道路”。因此党便向所有革命工作人員（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提出了“又紅又专”的要求。这可說是很合时宜的。

所謂“紅”，就是要我們真正能够树立起馬列主义世界觀。所謂“专”，就是要我們真正能够具有高度的业务能力和高深的专门知識。

既要“紅”，又要“专”，这是否可能呢？可能，一定可能。在反右派斗争以前，很多右派分子曾极力反对我們这个說法，反对我們这样来要求所有革命工作人員。如說什么“紅”会妨碍“专”呀，要“紅”就不能“专”呀，以及什么先“专”后“紅”，只“专”不“紅”也可以呀等等，說法虽然很多，其实他們所反对的只是“紅”。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所說的“紅”，就是要彻底肃清資產阶级思想，而他們却又不肯放弃自己的資產阶级思想，因此就必然要反对我們提出的又“紅”又“专”的号召和作法。

那么怎样才能作到又“紅”又“专”呢？能不能彻底克服我們思想上存在的資產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关键。因为所謂資產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乃是資產阶级思想的核心。因此凡是具有資產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如果不下决心彻底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不但不能既“紅”又“专”，而且还会跌入右派泥坑尚不自知的极大危险。为了使每个同志都深刻的了解到資產阶级个人主义的严重危害，周揚同志在他的文章里，曾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所分析和批判的对象虽然是丁玲和馮雪峰等右派分子，但对文艺界所有的同志，却都有极为

深刻的教育意义。因为文艺界的绝大多数同志，就其家庭出身以及过去所受的教育和世界观来看，用周扬同志的话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一般知识分子的身上，却又“特别流行、特别根深蒂固地不容易改掉”（夏衍同志语，见“中国青年”1958年第7期）。这一方面，是因为直到现在，全国广大群众还未完全摆脱文盲状态（经过文化革命高潮，就可根本改变），因此知识分子在全国人口中，还是少数，这就不免使知识分子在思想的深处，存在有极大优越感。因此他们就很轻视劳动人民，自以为不得了。我省大右派分子王文光在反右派斗争以前，所以那么嚣张，敢于口口声声大喊大叫“知识分子要为知识而斗争”的谬论，也与此大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几千年来在旧社会中一直有这样一种风气，总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也就更助长了一般知识分子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观点。不过这还只是就一般知识分子来说的；如果就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更易滋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为从事文艺工作，较之从事其他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如果稍有一些成就，就很容易出“名”，但一出“名”，如果稍不注意，就很容易产生名利思想，或自高自大，骄傲自满。一产生名利思想和骄傲自满，个人欲望就会越来越大，集体观念、组织观念，就会越来越小，因而也就会更加目空一切，更加目无群众、目无组织，以至象丁玲、冯雪峰以及象我省高沐鸿等一样，最后走上一条可怕的道路——即叛变党叛变人民的道路。因此，凡是想使自己很快达到又“红”又“专”，很快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同志，首先就必须努力克服掉自己思想上所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周揚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說：“貪圖名利和驕傲自滿，就成為不少文艺工作者生活上和政治上墮落的重要原因”。这几句話，我覺得每個同志都應把它銘刻肺腑，永記不忘。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是革命的大敵，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又“紅”又“專”的大敵，克服的方法，首先必須端正自己對文艺工作的看法，把文艺工作看作是黨的事業的一部份，絕不能把它當做“滿足個人名利欲望的工具”（周揚同志語）。但要切實作到這一點，也還很不容易。关键在那里呢？根據我閱讀了周揚同志的文章的初步感覺，是由直到現在，很多同志對於個人主義的危害，彷彿認識得还是很不深刻。

周揚同志說，“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是無法調和的”。但在對待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問題上，也有兩種人、兩種態度。一種人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經過碰壁、摔跤，終於逐漸丟掉了包袱，因而輕松愉快地前進了。另一種人則是，雖然不斷碰壁、摔跤，但却總不肯丟掉個人主義的包袱，反而越背越重，死也不肯把它丟掉，因此，最後的結局，只有走向黑暗的末路。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極為廣泛、極為深刻的革命，它不但要革一切舊的經濟基礎的命，也要革一切舊的上層建築的命。因此，也可以說，社會主義革命不但要革資產階級的命，也要革小資產階級的命，革個人主義、本位主義、自由主義、平均主義以及一切壞思想、壞行為、壞作风、壞習慣的命。

現在我們雖然早已開始了社會主義大革命，可惜我們許多同志的思想太後退於實際，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看法，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這不但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